

15岁时我来到当时的河北省城保定。我来保定得力于我在“华大”的学习,那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。

“华大”是华北联合大学的简称,当时它设在正定那座天主教堂里,庭院里盛开着月季花。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、还演戏、画画。我了解到劳动创造了人,也不自觉地接近了文艺。于是省文工团到“华大”来招人,经过“严格”的考试,录取了我。那考试很具专业性。在考场里,一位个子不高、穿皮夹克留长辫子的女“考官”问我,你会哭吗?我蒙了。她说这就是考试,你哭一个。我为难着不知所措。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为难之处,便对我说:你想一件伤心事,就会哭出来。我按她的指点去做,想起一件伤心事,想着想着掉下了眼泪。我成功了。考试当然还有其他内容,比如朗诵。还是那位穿皮夹克的女士,信手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,指出一则短文让我念。我念起来,念得很吃力。这因为两个原因,一是我口吃,二是我的家乡口音。很快她制止了我。但两天后,这位女士还是把我领进了省城。从此我便是“圈内”人了。我的进“圈”是得力于我的哭吧。显然不是得力于我的朗诵。

原来那位穿皮夹克、梳辫子的女士叫贺昭,河北省文工团团长。她的穿着和谈吐很是与众不同,给人一种“个别”、干练的感觉。贺昭的先生洪涛,也是省文艺术界领导之一,他们都是南方人。

那时我觉得省城保定很大,从火车站到文工团驻地要穿过那么长的两条街,西大街和北大街。我和贺昭同坐在一辆马车上,马路着保定的鹅卵石街道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赶车人叫老马,说一口保定话,在车辕上和贺昭聊天。那時的保定街道上沒有汽车,自行车也很少,马车和行人摩擦着前进。原来这车就是省文工团的交通工具,管接人送人。演出时,把灯具、布景也装上大车,还是在大街上和行人摩擦着前往剧场。

保定很大,新鲜也多。现在想来许多极平常的事,当时也觉得新鲜。比如吃土豆、吃芹菜,冬天取暖烧煤球,屋里的拉绳开关……当然最新鲜的还是发生在舞台上的一切。

后来我逐渐熟悉了舞台这个方匣子里所发生的一切,站在舞台一侧看戏时,竟“研究”起故事中那些不合情理的虚假之处了。当时虽然我的理解能力浅薄,但还是能看出故事中那些不合人情的地方。我之所以能看出,是因为戏剧故事演的就是人类生活。人类看自身的行为,或深或浅总能看出几分毛病。除非你是视而不见,因了其他。

有一次剧团要参加全国话剧汇演,贺昭团长把省内的一位“剧作家”介绍给大家,说他为汇演专写了一出话剧。写一位叫春生的复员军人回乡带领村人走合作化道路的事。剧作家当场朗读了剧本,他带着浓重的冀南口音,自我感觉极好。后来这出戏参加汇演,剧本还得以发表,作者拿到一笔稿费,在北京买了一所四合院。那时稿费高,

房价低,1000元就可以买个四合院了。这是后话。

这出戏里有这样一个情节:有位老奶奶——主人公的奶奶,因思念参军打仗的孙子春生,每天站在村口瞭望等待,盼孙子回来,达8年之久,使得老人双目失明。当孙子春生真的复员回家时,奶奶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。

若不细究,这一情节也就被忽略了。细究,便是逻辑的混乱。神话可以,民间流传的那些“望娘滩”、“望儿滩”,那些望娘望儿的活人都可以变成石头变成山,现实中老人(或孩子)对亲人的瞭望式的等待是有限度的,若没有近在眼前的希望,人不是做出生理上过分的追求和期盼的。何况孩子是要参军打日本、打老蒋去了,老人家是大可放心的。

那时我站在舞台一侧看戏,想到这位编剧在北京买房子的事,便强制自己去相信这一情节的合理性,因为这是一位剧作家写的呀。他买得起四合院。

贺昭有时也站在舞台侧幕边看戏,我很想就这一情节听听她的看法,但我尚没有勇气和贺昭交流。我们一起在后台吃午饭(大半吃包子),我们可以就包子论包子。她像个老熟人似的叫着我的名字喊:“铁扬,你说这包子咸不咸?”我轻描淡写地应付着。

那时贺昭给我的感觉有时像一位风度翩翩的艺术家,有时又像一位快人快语的爱管家的老大妈。她和赶车师傅聊天,指出已做妈妈的女演员给孩子喂奶时的不规范之处;指出炊事员搭配伙食的弊端,她把炊事员叫过来,说:“别光给大伙吃白菜土豆,常到菜市场转转,买点新鲜的。”

在生活上贺昭总是要给大家闹出点新鲜的。那时我们每年要发冬装、夏装。有一年她对管总务的说:“今年把夏装改进一下,做乌克兰服。”顾名思义,乌克兰服是乌克兰人的衣服,是一种宽大的套头衫,胸前还沿着花线条子。后来我们穿着它在保定大街上走,很是风光。

有一年我们排练苏联话剧《曙光照耀莫斯科》,贺昭作为主演还思考着剧中人物的穿着,她让我做服装设计。此时我已放弃我的“表演才能”而改作舞台美术工作。贺团长在会上点着我的名说:“你明天就去北京买高跟鞋,不论主角配角,女演员一人一双。买回来就发给大家穿,得练习走路,不能等上台再穿,要藏脚的。”

我买回高跟鞋发给女演员,她们不会穿,贺昭就穿起来给大家做表演,作为南方人的贺昭,显然是熟悉此物的。

在北京我还了解了一些“苏装”的特点和外语称谓,向贺昭汇报。贺昭也跟我学着用俄语说着:“布拉吉”(连衣裙)、“不劳斯”(女衬衫)、“诗拉帕”(礼帽)……我把我的服装设计图给她看,她指出一件用刚学来的俄语说:“这件布拉吉颜色不好,太老气”……后来我们的戏在省会演出,大出风头,散场后贺昭和我步行回住处,说:“铁扬,咱得进步啊,演外国

戏就得学点外国文明。”

贺昭和我在这次的共同“进步”之后,不久就做了告别,她离团进京,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苏联专家的导演进修班。两年后我们再见时,我已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本科生,我们常在校园相见。秋冬时,贺昭还是穿件皮夹克,长辫子已不再,改成一头蓬松的短发,显得人更干练。每次相见,贺昭都向我摆摆手叫着我的名字说:“来,说两句话。”很自然我们就谈起河北。谈到我们的过去。一次她问到我那次的哭,她说:“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你,那次我考你你想起了什么就哭了。”我躊躇着,不想告诉她,因为那是我埋在心里很深的一件事,它联系着“政治”。贺昭还在问我,点上一颗烟(贺昭抽烟,显得很“派”),以探究的眼光望着我,看来她是要问到底的。



我在不得已时告诉她,我说,我在老家上小学时,是儿童团长。也许我一向神气活现,直到1947年“土改”时,我的命运才有所变化——我出身不好。在学校因了一个不值一提的理由,我被“双开除”了。但我不愿告诉家里人。每天该上学的时候我还是装模作样地背上书包走出家门,做出一副去上学的样子。然而我走出家门后就溜出村子,钻进庄稼地一坐半天,直到中午回家吃饭。这情况达一月之久。一天我又要背上书包出门时,父亲叫住了我,说:“别去了,我都知道了。”他声音平和带着几分凄婉。我止住脚步,泣不成声地背过身去。

父亲对我一向严厉,若我平白无故逃学,他是不会饶我的,而现在他只是叫住了我。父亲在当地也是一位有身份的革命者、社会活动家,现在因了“时局”的原因,他也像“赋闲”在家。

我把故事讲给贺昭,贺昭以一位导演的角度说:“我明白白了,致使你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,一是你被迫离开了学校,二是你父亲叫住了你,你能告诉我致使你哭的是哪个吗?”我告诉他是第二个。她说,这就对了。为什么,因为这合乎逻辑。符合逻辑的逻辑才能出现真实的“规定情景”,你父亲叫住你是个意外,这个意外就是此时此刻的规定情景,这使得你非哭不可。哭是靠了规定情景的感染。“规定情景”是演剧学里一个很专业的名词,看来贺昭当时正研究演剧理论中的“规定情境”。在舞台上,人物的一切行为都和规定情景有关,而规定情景正是产生于合理的逻辑。

谈着规定情景,贺昭约我到她家去吃面条。在路上她从南锣鼓巷一切面铺买了切面。当时贺昭全家住棉花胡同22号,中戏在12号,22号距12号只有几十米远。22号是个艺术家大院,那里住着中戏许多名人教授。

我和贺昭常常在校园相遇,常常听贺昭讲关于导演学的一些知识,话题也经常转向在河北时的一切。谈得轻松愉快,不幸的是我们在“中戏”还遭遇到1957年的“反右”斗争,当时我所在的班级是个“温和”的班级,是唯一一个没有出学生右派的班级。当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,校园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时,我们正躲在教室安静静物,大家一面观察着静物的安静,一面听着室外那些讲演、争论的喧嚷。但运动的发展是由不得你的,有时你不找运动,运动也要找你。运动终于找到了我:系领导要我去批判贺昭。贺昭将要被定为右派了,此时她已毕业在本院所属的实验话剧院任职,现在在该院挨批斗,运动的发展需要一些知情人去发言。我是贺昭在河北的“战友”啊,领导要我去揭发贺昭在河北时反党的或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言行。系领导还告诉我,这也是对我的考验,学校正在学生中划“左、中、右”。

晚上,我在床上辗转反侧: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“难处”。我实在找不到贺昭在河北时的反党言行。但学校已把我当成了贺昭的“知情人”,何况又告诉我学校正在学生中划“左、中、右”。我实在又不愿因了我的“萎缩”甘心向“右”。再说,从一位身居领导干部的身上找一点“不符合党的原则”的言行,还是可以找到的吧。花了几个晚上,我终于想出三条:一、贺昭在河北期间,常常以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我们,我们穿粗布棉袄,她穿皮夹克。二、以拍戏需要为名,向大家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:借戏里有“郊游”,就带我们去郊游;借戏里有女性人物穿高跟鞋,就提倡女同志在生活中穿高跟鞋。三、用公款制服装费不为大家做规定的制服,却做“乌克兰服”。

以上内容我就如此这般的在批斗会上结结巴巴地讲了出来,当时的会议主持人是著名演员于蓝。贺昭看我发言,表情很是异样,显然我的出场很使她意外。但我发言时,她还是在一个月本子上半真半假地记着,有时朝着房顶看看想想。

于蓝不知道我的名字,管我叫“河北同志”,我发言结束后她说:这位河北同志发言很生动,有内容。但我惧怕再见面贺昭,面对她我将无地自容。

也许因了我的发言,改变了我在运动中不明不白的身份,我开始被使用办起了校办的《真理论坛报》。

自那次批斗会后,我再次见到贺昭是我毕业离校2年之后,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。我回母校任教,母校还在棉花胡同22号。

一次,我在棉花胡同遇到迎面走来的贺昭。贺昭认出我,笑着向我伸出手,两鬓的白发随风飘着。正是入冬时节,棉花胡同的风格外暖。贺昭

穿一件崭新的羽绒服,本来就不算高的身材显得格外宽横。

我躊躇着伸出了手,一时不知说什么,想到那次的发言,心里七上八下,更不知对贺昭的右派定性起了多大作用。贺昭是被定为极右派的,经过多种形式改造吧。没想到20年后再见面的贺昭却就她的羽绒服抢先对我说:“铁扬呀,快去买羽绒服吧,在地安门商场,减价了,不到40。”那时我的工资是64元8角。

我看着她身上那一个个轻盈的“大泡”,还在想那次的发言。贺昭大约看出了我的尴尬,就专说起她正在排戏的事。她仍在实验话剧院做导演,正在导着一出叫《未来在召唤》的话剧。对她目前的工作显得信心百倍、雄心勃勃。原来20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为她留下什么消极的痕迹。她约我去看戏,我答应她一定去看。后来贺昭又约我去她家吃面条,我又来到她22号的家中,我们七拐八拐又走进她那两间中西合璧的老房子:典型北京四合院的门窗,却铺着老松木地板。回家前,贺昭又在南锣鼓巷买了切面和肉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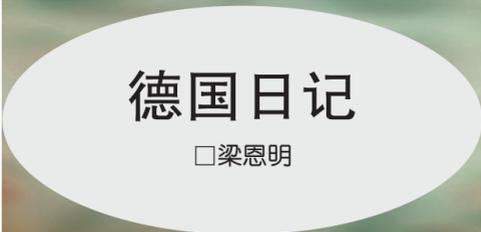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他的先生洪涛已经去世,“文革”期间他死于外地一个“五七”干校,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已离家,现在贺昭一人住在这里。

吃着面条,贺昭到底才谈起了“反右”时的那次批判会,她又是带着一个艺术家的职业特点谈起的。她谈到艺术创作中“逻辑”这个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。她说我那次的发言,对她的右派定性没有起什么作用,因为它缺乏必要的逻辑性。她说:“铁扬,你想,逻辑不对,他们没法上纲啊。乌克兰服是苏联老大哥的呀。你说的那两个问题也是为了排练苏联话剧《曙光照耀莫斯科》所必要做的呀。郊游,穿高跟鞋,都是戏里有的呀,得体验、得练习,咱们河北离这太远,咱们本土。我要是带头学美国,那可就是原则问题了。”

没想到贺昭的几句话,使我如释重负,很快我们就谈起了艺术。那时,我正和我的老师齐牧冬一起为中央歌剧舞剧院设计舞剧《文成公主》,这也是后来我没有去看《未来在召唤》的原因。

贺昭买肉馅是用来做炸酱的,可惜她的炸酱炸得有点老,炸出的酱发硬。她看着我吧一块酱放在碗里,左搅右搅搅不开,就告诉我加点醋。醋果真稀释了坚硬的炸酱。

最后,我们少不了又谈起河北的事,七拐八拐拐到那出话剧。贺昭说:“什么什么什么呀,一个老太太盼孙子回家盼瞎了眼,在村口一站8年,胡编乱造,孙子是打日本打蒋介石的呀,也是个逻辑混乱。”贺昭快人快语,有时说话连着说几个什么什么,像指问又像否定。这时靠了眼前的气氛我斗胆问贺昭:“当时你是团长啊。”贺昭说,“推荐”来的。不知她指的是那位作家还是那位作家的剧本。我本来想问谁推荐的,但又觉得这已经不是我该问的了。吾国吾民是懂得适可而止的。再者,谁推荐的,那已是遥远的历史。



6月29日

昨晚到汉堡,住火车站对面的俾斯麦酒店,是四星级的老店。开门的钥匙系吊的铜柄是古董,又大又沉。房间的楼道,弯来拐去,我们入住五楼,要乘两次电梯。干净简洁的房间里,热烘烘的,没有空调。德国每年只有半月的夏天,恰是我们赶上了。

德国每年生产那么多的一流空调机,自己不用,全销国外,是怕污染环境吗?大街上,他们抽烟的男女够多的了,跟北欧人差不多。德国人抽烟的多,是压力大,解闷;北欧人抽烟的多,是悠闲,享受。抽烟的理由都能自找,至于污不污染环境,那是别人的事。

风风留学德国的同学找到我俩,带我们去游汉堡的外滩,走累了,坐在海岸栈桥的天棚里喝啤酒。凉风拂来的外滩,楼高道宽,像我们繁华的上海浦东。

中国人喜欢浦东,那是浦东像发达国家。西洋人不喜欢浦东,那是浦东像他们国内。西洋人来中国,与我们去西欧所要欣赏的正相反,他们来中国,希望看到的是当年安东尼奥拍摄的《中国》场景,那才符合他们看动物世界的口味。

这世界也是,我们推鸡公车的时候,他们骑自行车。我们有自行车骑的时候,他们家家开小汽车。现在我们家用轿车也渐渐普及了,可他们又像不用空调机似的,玩起了没有硫化污染的自行车来。这里的码头,火车站到处是前扶手挂筐的自行车,买来的日用品都装在筐里。这社会还会不会退回鸡公车时代?如果会,他们还是走在时代的前面。

德国大一统的历史并不长,俾斯麦铁血立国就走到了时代的前面,只是那时走在时代前面的不是文明人,是一批强盗。我们最早认识的德国人瓦德韦,就是八国联军的强盗头。他们靠掠夺别国的财富奠定了自己文明的基础,而深受其害的我们跟不上做贼的步伐,一步不及,步步落后。我们早年没有抢人的本事,就不必羡慕别人漂白了的辉煌。勤劳致富,肯定没有抢劫致富来得快。汉堡内河有一片旧式的建筑群,那是百年前都市的一角,可谓海盜之家。船在高楼夹岸的河道中行驶,红砖裸露的岸楼,阳台上还设有滑轮起吊机。远洋抢运回来的赃物,不用人力,可以从河船上直接吊进屋里。

当然,做强盗也有挨打的时候。我们去城中参观了二战仅存的一座高塔教堂。登上75米的高空,就像站在日本东京大厦之巅俯视东京湾那样,看到的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实力。塔顶的廊屋里,悬挂着许多二战时汉堡被炸的照片,满目疮痍的废墟堆里,惟独这座塔没有倒下。德国人至今既不修复,又不撤出,让遍体鳞伤的它直立于闹市,是要告诫后人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,还是要激励后人振兴?

德国人在抢人与被抢中历练得刚毅又坚韧。他们至今仍能吃苦,汉堡地铁的车厢里同样没有空调,我热得额汗直冒,脱衣露衫,而衣冠楚楚的德国人几乎没有感觉,偶见拿有纸盒冰淇淋的妇女,也只是默默坐在那里,挑食解热。他们像日本人一样,至今勤俭,习惯于将餐馆吃剩的食物打包带走。

当然也有无赖,傍晚,我们回宾馆,在要拢的街巷,看见一个酒鬼,敞胸露怀地斜躺在地上,又吐又喝。他醉得爬都爬不起来了,还把酒瓶塞在嘴里。

7月1日

从汉堡到柏林,已是正午。柏林的气候比汉堡还热,进房间,终于有了冷气。吃过午饭去参观帝国大厦、国家博物馆、柏林墙。来去匆匆。

电影里见过的帝国大厦,给人以威慑,而实地的感觉并非如此。站在大厦前开阔的草坪上留影,与站在美国白宫草坪上留影,没什么两样。建筑的本身并无人性,只是我们来到这里,很容易联想到它曾经代表过的邪恶。

二战在这里策动,又近似于在这里结束。

当年苏军为靠近这里,一条街、一幢楼的与德军血拼。攻克柏林,苏军死伤了三十多万人,足见德军最后抵抗之顽强,苏军用血换来的胜利又是多么惨烈。

常规战争,人的因素第一。人的精神力量,最大莫过于宗教式的狂热。历史上出现过的最有市场的思潮,未必就是历史的正道,尽管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,释放出很大的能量。德国、苏联在一战后的世界大动荡、大萧条中率先复苏崛起,就是这迷人能量的凸显。这能量在当时的世界上,是任何其他力量都难以战胜的。一个涌现出无数哲学家、思想家的理性民族,短短10年间变得如此疯狂,绝不是少数魔鬼蛊惑了民众,更多的应该是:时代造就。时势造就英雄,也造就魔鬼。

德国国家博物馆里,现存播放的纳粹时期的实况录像,那万众欢呼的造神场面,如果将时空的镜头切换到当时苏联的红场,同样令人热血沸腾。

西方当时之所以采用绥靖政策,“祸水东引”,是想让这两股洪流直接相撞。结果苏德条约的秘密签订,打破了张伯伦的美梦,世界力量倾斜了。希特勒横扫欧洲,视同胞,其力量之可怕,是一战的胜利者英法绝对没想到的。苏德战场之所以不同于欧洲战场,那是当时最精锐、力量最强的两股势力——苏德战场,注定了人类史上最残酷、最惨烈、最惊心动魄的战场,以致于打到了柏林的帝国大厦,还有那么多人在希特勒死后宁死不屈,其中包括十几岁的孩子。

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。幸在德国人早已摒弃了纳粹,已经反思那段历史悲剧。德国的总理能在犹太人的陵墓前跪下去,那跪下去的瞬间,世界人民不同程度地宽恕了他们曾经犯下的反人类的罪行。但德国人至今闭口不提希特勒,我们问过好些德国人,我感他们的认识比我们清楚,那段历史悲剧是他们全民族的悲剧。就像当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,绝不是天皇个人的作用。

现存的柏林墙,仅有一截残壁,东西两面的正中还保留着一个检查亭。检查亭的西面仍悬挂着美国星条旗,东面还竖着一个苏军的大头像。畅通无阻的车来人往,已经感觉不到当年的戒备森严。听说当年翻越此墙奔向自由者被杀上千,用热气球飞越的,也未能幸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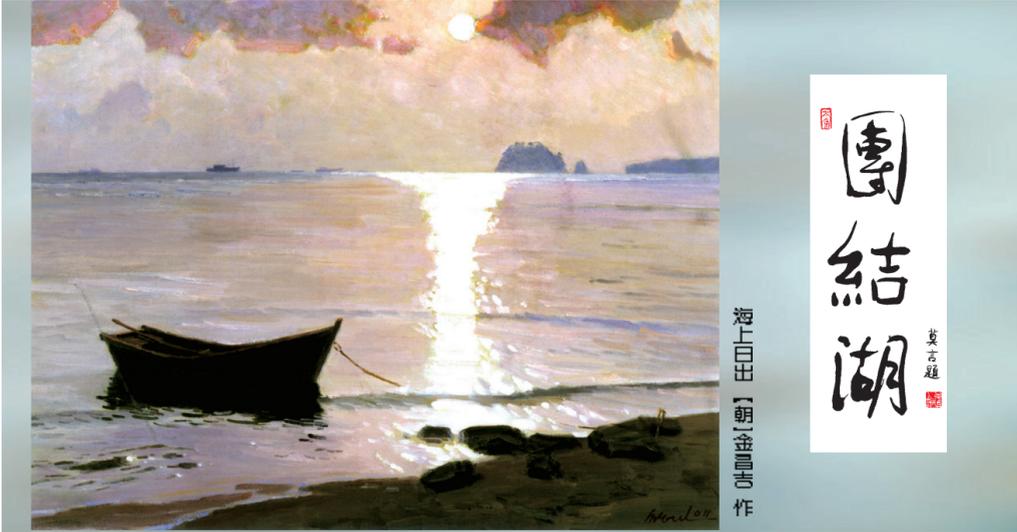
7月3日

火车上睡了一夜,醒来到了慕尼黑,这是德国第三大城市,巴伐利亚州的首府。

去参观著名的白天鹅城堡,再坐两小时火车,就到了横跨几国的阿尔卑斯山脉。

湖泊白天的山脚,蓝影四现;森林覆盖的山巅,露现的古堡像一只白天鹅,翱翔在湖光山色之上。

据说这是厌于朝政的路德维希二世,耗费巨资,亲自设计建造的遁世乐园。避世的君主,成天躲在这阴森森的丛林里,未必欢欣,其心恐怕只有他耗尽心力的古堡知道。后人大都



公认他有艺术天分,无治国之能。其命运注定好不过李后主、宋徽宗。大凡玩艺术的家,都很难做社会实事。社会实事是在人与人之间拼搏的动态中成就的,艺术是在自我战胜的静态中玩出来的。天生不玩艺术的他,除了误国,还留下了舍本求末的艺名。

来这里的游人不少,我们走上山,见弯曲的山道上有乘马车的。这里的马拉车走得不及人快。驾车人控制马速,只能手抖缰绳,动鞭抽马是违反动物保护法的。我走了,停下来想坐滑竿。这哪里会有滑竿?就是有,怕也没人敢坐。人抬人,不就似人骑人,那不是回到了奴隶社会?外国人注重的平等与我们景区现在还保留的国粹,岂止是文化的差异?

步入古堡,层层通连的厅堂,华贵得似官殿。听说路德维希二世把他童年生活的王宫搬来了这里。堡内四周窗口望出去的多彩景象,就像路德维希二世幸福的童年。这位早年失志于表姐茜茜公主的君王,把他那片像白天鹅一样洁白无瑕的真情倾注于山水,梦托于幻境,就是这古堡的魅力所在。终其一生,他都沉浸在童年幸福的回忆里。这于他治国,可能是最大的不幸,而于他的艺术想象,又可能是最大的幸运。

冷酷的现实是不相信圣洁的。未泯的童心哪能应对腥风血雨?

他的国,注定了要亡的,但亡国后,民众还怀念他,他又不失为仁君。听说他与当时一统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还是朋友。无论从性格、志趣、爱好哪方面看,他俩都是无缘的。也许,他俩是两极互补:他有的,恰是俾斯麦没有的。一个独善其身的君王,未必是好君王;一个超凡脱俗的艺术家,一定是后人称道的艺术家。可惜,两者汇于一身,就显得有些悲剧意味了。

我转悠在堂皇的古堡里,无心欣赏那些世间的奇珍,就因为平庸君王用过的,在我眼里都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。古堡内灯火通明,人来客往,可我仍感觉阴气凝重,担心深夜闹鬼。室内那么多的白天鹅装饰,都难以幻化成我脑里的仙境,难怪,久呆于此的这位君王要患忧郁症。

7月5日

去科隆,途经波恩,在那里停留,顺便观光。贝多芬故居,曾经西德首都——波恩,我没想到如今还那么小,小得就像乡镇,20分钟可逛通城。

据说当年波恩有四景。我们走过了,才知身后的邮电大楼,街边的三层老楼算一景。贝多芬广场,当然更算一景了。我们来到广场的贝多芬铜像前,怎么取景也避不开铜像身后的邮电大楼。两景相拒之近,只能说明广场太小,小得不能再小了。再往前走,是一条石砌的步行街,街道两旁古色古香的商铺,夹杂着一个小院,若没有标志,我们同样会错过,那更是一景——贝多芬故居。再往前走,过一个菜市,就是莱茵河畔。莱茵河畔的树荫草坪上还有一景,而如今的市政大厅——当年的国府。两层无人进出的楼房,耀在阳光下,好似留给后人瞻仰的纪念馆。

你别小看这四景,当年可是波恩最繁华的地方。二战后,被肢解的西德,为何定都在这里?听说首任总理阿登纳,为摆脱英美控制,拒绝去法兰克福设府,而选择了他的故乡。其理由是:当时德国的所有大都市几乎都被苏英美联军摧毁,惟独波恩小,劫后无损,便于接纳八方来客。据说当年为此,还进行过全民公决。

德国,两次跌入战败的深渊,而且资源匮乏,还受制于人。它能从废墟中爬起来,迅速崛起,几十年内统一走进世界经济第三大强国的行列,其卧薪尝胆的精神令人深思。如果说抗战时的美国考察团到延安,从黄土高坡那一排排简陋的窑洞里,能洞察到中国未来的走向,那么今天,我们到波恩,同样能感受到它当年在德国民众中的凝聚力。城里没有高楼,城外不见别墅,更莫说戒备森严的深宫。我不知当年的西德大员们,在这市井人家和田园风光的都市里怎么生活?

能与民同苦政府,它就是有些过错,都会得到民众的谅解。不能与民共而中饱私囊的官员,他就是再有才能,民众也是痛恨的。一个国家在非常时期,最需要的就是官兵一致同甘苦的精神。这是为官者最难能的精神,也是最具凝聚力的精神。波恩,我若不是路过,几乎把你忘了。